

論海登·懷特《後設歷史》中的 諷喻觀念——兼論凱斯·詹京斯的詮釋

陳信治*

本文首先針對英國學者凱斯·詹京斯聲稱美國思想史學者海登·懷特的《後設歷史》是一部提倡諷喻之作的說法提出批評，指出懷特對待諷喻的負面態度，明顯地與詹京斯不同。其次，本文以《後設歷史》中討論馬克思、布克哈特、克羅齊三位歷史思想家的方式為例，具體說明懷特在《後設歷史》中使用諷喻觀念時，雖然基本上為諷喻賦予負面意義，但也同時存在著界定不夠嚴謹、使用過於廣泛的問題。最後，本文追溯《後設歷史》中為何賦予諷喻負面意義，以及諷喻進行自我超越的理論依據。藉由對照黑格爾、維柯、伯克、弗萊等人對於諷喻此一觀念的討論，本文認為：懷特將諷喻視為四個主要喻格之一，固然是源自於維柯，但是將四個喻格視為構成一個循環或螺旋，則是懷特自己對於維柯的詮釋。至於懷特將這個循環過程末端的諷喻賦予負面意義，更是轉接了黑格爾對於浪漫主義諷喻的批評。

關鍵詞：海登·懷特、後設歷史、諷喻、凱斯·詹京斯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歷史想像始於托克維爾結束的反諷情境。……布克哈特審視著這樣一個世界，其中美德通常會被背叛，才華被扭曲，而權力被轉為服務於更卑鄙的目的。他看到自己的時代中少有德行，而且沒有什麼值得他給予毫無保留的忠誠。他唯一的摯愛是「舊歐洲的文化」。但是他把這種舊歐洲的文化想像成一座廢墟。在他看來，這就像普珊(Poussin)的風景畫中被藤蔓和青草覆蓋而搖搖欲墜的一個羅馬紀念碑，抗拒著被「自然」再次湮沒，而這紀念碑原是相對於自然而樹立的。他不抱著修復這座廢墟的希望。他只滿足於記住它。布克哈特對任何事物都持反諷的態度，甚至對自己也如此。他並不真正相信自己是認真的。¹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在美國思想史家海登·懷特的名著《後設歷史》中，諷喻(Irony, 或譯「反諷」)是其理論架構所使用的四個喻格(tropes, 或譯「轉義」)之一，其它三個喻格則分別為隱喻(Metaphor)，轉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²

¹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Century Europe*, p. 234; 中譯本：陳新譯，彭剛校，《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頁 319-320。此書另有劉世安中譯本：《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但是由於陳新中譯本的譯文較為流暢，故為本文所採用；如有必要，本文也將對其譯文加以修改，並加以註明。本文在引用懷特及其他英語世界作者的文字時，以英文本為主要依據，但是也盡可能列出既有的中文譯本，以便讀者參照。以下引用各書譯文處，均簡稱中譯本，並加註頁數。

² 本文對於 Irony 一詞的中譯「諷喻」，採用劉世安的譯法，因為 Irony 在

對於留心史學理論的學者而言，可能已經是常識。然而在另一方面，懷特在書中的序言與結論，又自承是以諷喻的方式寫作此書，以求達到超越諷喻的目的；從懷特自己的這個說法看來，諷喻在《後設歷史》中的重要性，其實至少可以作為貫串全書的主軸之一，而無法單純以「四個喻格中其中一個」的角度來衡量。³因此，近年來研究懷特思想的學者中，已有赫曼·保羅(Herman Paul)將《後設歷史》中的諷喻觀念特別挑出來加以分析討論，企圖解釋懷特是在何種意義下，提出「以諷喻超越諷喻」這個看似矛盾的的主張。⁴筆者對於《後設歷史》中如何使用諷喻的問題亦深感興趣，於是草成此文，希望在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繼續探究。

就筆者所知，在中文學界的討論中，以李鑑慧最早指出懷特在《後設歷史》中對於諷喻有所不滿：

在懷特看來，十九世紀下半以來，西方專業史學的成型正是歷史負擔逐漸沉重、自由逐漸被束縛的一個過程。……[與上

《後設歷史》中對照於 Metaphor(隱喻)、Metonymy(轉喻)、Synecdoche(提喻)而出現，所以譯為「諷喻」比較妥當。不過，本文在引用陳新中譯本與涉及羅遜思想時，則維持使用「反諷」。至於 Irony 的其他譯法，如朱光潛翻譯黑格爾《美學》時所使用的「滑稽」，朱氏翻譯維柯《新科學》時所使用的「暗諷」，以及賈士蘅翻譯詹京斯《歷史的再思考》時所使用的「諷刺」等等，本文引用時均保持原譯。

³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xii, 434; 中譯本頁 5、594。

⁴ Herman Paul, "An Ironic Battle against Irony: Epistem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Irony in Hayden Whit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55-1973," pp. 35-44. 更早的例子可見 John S. Nelson, "Review of *Metahistory* by Hayden White," pp. 74-91; Ewa Domanska, "Hayden White: Beyond Irony," pp. 173-181. 亦參見 Lloyd S. Kramer,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pp. 97-128; 中譯本：〈文學批評與歷史想像——懷特與拉卡頗的文學挑戰〉，頁 147-185。

述過程相對應，] 懷特認為西方歷史意識之深層結構恰好經歷了一個封閉式的循環模式：由啟蒙時期後期的「諷喻」意識開始，歷經「隱喻」、「轉喻」、「提喻」等過程，最後再回到「諷喻」狀態。各種意識雖然同樣都是透過寫實主義之形式再現歷史，唯獨諷喻式的歷史意識特別具有一種懷疑色彩濃厚的理性觀，是懷特所不樂見的。⁵

李氏這段文字，確切指出懷特對於諷喻的負面看法；筆者在本文開端引用了懷特在《後設歷史》中對於歷史學家布克哈特以諷喻方式寫史的一段評語，應該可以為懷特對於諷喻的負面看法提供一個實例。下文仍將針對懷特如何評價布克哈特的問題略有一些討論。

然而，在中文學界中影響甚廣的英國學者凱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對此卻有相當不同的詮釋，認為懷特對於諷喻的看法基本上是正面的。在他的《歷史的再思考》、《後現代歷史學——從卡爾和艾爾頓到羅遜與懷特》、以及《為什麼要歷史？倫理學與後現代性》(*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等幾本作品中，詹金斯凸顯懷特自承以諷喻方式寫作的宣告，並且將美國哲學家理查·羅遜(Richard Rorty)所主張的反諷主義與懷特的諷喻相比附，認為兩人都主張：現實(或者過去)「是可以無限地予以重新描述的」，因此「愛怎麼樣寫歷史都可以」或者「無所不可」(anything goes)。⁶

5 李鑑慧，〈知者無罪——海登懷特的歷史思想〉，頁 1-55，引文見頁 17。亦參見韓震、董立河，《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頁 288-289。

6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esp. pp. 64-68; 中譯本：賈士薈譯，《歷史的再思考》，特別是頁 187-193。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pp. 112-118; 中譯本：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從卡爾和艾爾頓到羅遜與懷特》，頁 188-197。Keith Jenkins, *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esp. p. 130. Richard Rorty,

筆者以為，詹京斯的詮釋與懷特在《後設歷史》中追求「超越諷喻」的立場有不小的差距。從懷特對諷喻的負面評價來看，《後設歷史》雖然列出四個喻格(以及其他分析歷史敘述的方式)作為歷史寫作的選項，其中包含諷喻在內，但諷喻卻被懷特列為最壞的選擇。換言之，懷特的確提倡更多元化、更有活力的歷史寫作方式，但並非主張「愛怎麼樣寫歷史都可以」，所以詹京斯的詮釋恐怕大有商榷餘地。

因此，本文將於第二節首先回顧詹京斯對於諷喻及懷特相關論點的詮釋，藉以指出詹京斯的立論依據多半來自於懷特寫於不同時期的單篇論文，而於《後設歷史》這本書的採擇比較有限，以致詹京斯對於諷喻觀念在《後設歷史》書中所扮演角色有不同於懷特的理解。簡言之，詹京斯只看到懷特自承以諷喻方式寫作，以及他對當代學院歷史學的批評，卻未得見《後設歷史》將學院歷史學的問題視為諷喻之問題的一部分，而且對於諷喻本身也有傾向於負面的評價。

在澄清詹京斯的詮釋之後，本文從第三節起，將討論焦點轉回懷特《後設歷史》本身，並以《後設歷史》中討論馬克思、布克哈特，以及克羅齊三位歷史思想家的方式為例，具體說明懷特在《後設歷史》中使用諷喻觀念時，雖然基本上為諷喻賦予負面意義，但是同時也存在著界定不夠嚴謹的問題。第四節則更進一步，企圖從思想史的背景說明懷特如何經由對於前輩學者與思想家的詮釋，賦予諷喻負面意義，以及他如何理解「以諷喻超越諷喻」之可能性。

二、詹京斯對於諷喻及懷特相關論點的詮釋

詹京斯對於懷特《後設歷史》中所說諷喻以及其他三個喻格(隱喻、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中譯本：徐文瑞譯，《偶然，反諷與團結——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政治想像》。

轉喻、提喻)理論的詮釋，主要見於《後現代歷史學》，其大意为：四個喻格中的前三種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肯定歷史的意義，唯獨諷喻採取懷疑論或者否定的態度，主張過去本身沒有任何內在意義。⁷雖然歷史學者在構思歷史時，有權選擇這四個喻格中的任何一種，但詹京斯主張：「否定的」諷喻所發展出來的歷史詮釋，不僅是當代思潮(後現代主義)的大勢所趨，也是懷特本人的最愛。

詹京斯在稍早的《歷史的再思考》中，將後現代主義界定為對於以往各種權力與知識中心的挑戰，不再相信任何提供確定性的後設論述；歷史無法定於一尊，而必須從各種角度不斷地被挑戰與重寫。他並且借用了羅遜的反諷主義觀念，進一步地描述後現代的懷疑主義將如何運作於多元化的歷史書寫過程之中：

在《偶然、諷刺與團結》一書中，羅遜描寫了一個他所謂的自由主義諷刺家的人物(其實就是他本人)。……羅遜說，在十八世紀末時便已出現當今廣泛存在於我們文化中的看法，亦即只要重新予以描述…，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來好或不好，為人所喜或不為人所喜，有用或無用。而正是這個「重新描寫的轉向」，環繞著我們在本書中所特別感興趣的主題：「過去 / 歷史」。

如前所述，這個過去是可以無限地予以重新描述的。⁸

詹京斯所理解的懷特，與羅遜是同一意義之下的反諷主義者，主張：道德上的相對主義和認識論上的懷疑主義，是「社會寬容的基礎」。⁹詹京斯對於懷特這一部分思想的理解，在《為什麼要歷史？

⁷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p. 169-170; 中譯本頁 280-281。

⁸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pp. 64-65; 中譯本頁 187-188。此處譯文略有改動。

⁹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p. 56; 中譯本頁 174。詹京斯立論的根據為：Hayden White,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Discipline and

倫理學與後現代性》中的〈論海登·懷特〉一文中，有最明白的陳述。詹京斯在文中如是說：諷喻(相對主義、懷疑論……)這種後現代主義的思維，與「現代學院歷史學」、「客觀性」、「價值中立」這些學院主流價值水火不容、勢不兩立，並且讓學院派歷史家如伊凡斯(Richard J. Evans)寢食難安：「但是對於懷特而言，這種諷喻不是威脅，而是某種要快樂地接受的東西，而且可能還是要進一步超越的。」¹⁰

詹京斯接著解釋，既然懷特已經歡喜接受了諷喻，為什麼還要在《後設歷史》的結尾提出「超越諷喻」？正如對於羅遜而言，所謂的哲學問題是由特定歷史情境所塑造的，所以時至今日，這些問題不再值得追問。詹京斯由此類推：對於懷特而言，雖然諷喻(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等等)總是讓人難以作決定，但是在今天的變易情境之下，諷喻也會為作高度自覺的、負責任的決定提供必要的自省性。而這種能作適當決定的高度自覺基本上就是「後諷喻」。¹¹詹京斯跟著引用懷特《後設歷史》的結論，以求為詹京斯的上述詮釋尋找支持：

簡而言之，康德年老時說的是對的；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自由地構思「歷史」，正如我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來認識它。而且，如果我們想超越由一種被看作是唯一可能的「實在論」的、關於歷史的反諷性觀點所帶來的不可知論……我們只需要拒絕這種反諷性觀點，並願意以其他反對反諷的觀點來看待歷史就可以了。[因為]我認為，對於這種反諷性觀點的認知，為超越它提供了基礎。¹²

De-Sublimation,” pp. 58-82, esp. p. 227, n. 12; 中譯本：董立河譯，〈歷史闡釋的政治學——規範與非崇高化〉，頁 80-117，特別是頁 88。

¹⁰ Keith Jenkins, *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p. 130.

¹¹ Keith Jenkins, *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pp. 130-131.

¹² Keith Jenkins, *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p. 131.

然而，詹京斯在援引懷特相關文字時，採取了不甚恰當的節錄方式。筆者重新節錄懷特在《後設歷史》結論的最後兩段話如下：

簡而言之，康德年老時說的是對的；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自由地構思「歷史」，正如我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來認識它。而且，如果我們想超越由一種關於歷史的反諷性觀點所帶來的不可知論——這種關於歷史的反諷性觀點被看作是我們在歷史研究中能夠追求的唯一可能的「實在論」和「客觀性」來傳遞，而塞給我們的——我們只需要拒絕這種反諷性觀點，並願意以其他反對反諷的觀點來看待歷史就可以了。

這個研究，宣稱在反思經典時期的史學思想時是價值中立的和純粹形式主義的，[因此]在這個研究結束時提出上述建議，或者顯得與它自身描述歷史意識史時內在的反諷性質不協調。我並不否認，我研究史學思想史時的那種形式主義本身，反映了大多數現代學院歷史學在其中得以生成的反諷情形，但我認為，對於這種反諷性觀點的認知，為超越它提供了基礎。¹³

如果讀者留心對照以上兩種節錄，將可以發現：詹京斯的節錄在引用懷特原文時所刪去的字句，其實都是《後設歷史》原文列出的諷喻自身所衍伸之問題：「現代學院歷史學」、「客觀性」、「價值中立」。換句話說，懷特在《後設歷史》中本是將諷喻(相對主義、懷疑主義、不可知論等等)視為學院歷史學的屬性，並做為需要超越的批評對象。這和詹京斯的詮釋其實大有不同。詹京斯為了標榜諷喻(或後現代主義)的優越性，並將其與學院歷史學截然對立，在引用懷特「超越諷喻」討論時，便將懷特聲言諷喻與學院歷史學有緊密關係的文字(「我研究史學思想史時的那種形式主義本身，反映了大多數現代學院歷史學在其中得以生

¹³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433-434; 中譯本頁 593-594。譯文略有更動。

成的反諷情形」一概刪去。這恐怕不是引用文章時所應有的作法，足以構成詹京斯詮釋懷特的一處「硬傷」。

詹京斯的詮釋另外還有一個重大的疑點(假如不算是「硬傷」的話)，在於如何解釋懷特對待布克哈特的態度。詹京斯在《後現代歷史學》中認為，懷特不但欣賞布克哈特，而且就連懷特所支持的「過去本身沒有任何內在意義」這個諷喻主義的主張本身，也與布克哈特等人的思想一脈相承：

過去本身沒有韻(rhyme)也沒有理由(reason)的這種理念，亦即，過去是怪異可笑(grotesque)、荒謬(absurd)、或者崇高(sublime)的這種理念，是一則教訓；懷特似乎是習自於他對布克哈特、叔本華、尼采、卡繆和沙特等人的「存在主義式」解讀；而且不要忘了，懷特似乎也同意，舉例來說，布克哈特以對過去所作的切割透視來配合他自己的目的之作法。布克哈特很早以前就拋棄了藉由連貫的敘述來「訴說過去之真實性的夢想」，因為他老早就不相信，歷史具有任何固有的意義或重要性。懷特說，布克哈特承認的唯一「真實性」，是他從叔本華那裡獲得的，亦即，「任何想要付予世界以形式的企圖，以及一切人類的肯定斷言(affirmation)，最終是悲劇地注定是要失敗的，但是個人的肯定斷言卻能獲得它自己本身的價值，只要它可以成功地賦予世界的混沌狀態以一種瞬間的形式的话。」¹⁴

此處詹京斯所引述懷特對於布克哈特的正面評價，以及對布克哈特與叔本華之間思想關係的討論，出自懷特稍早的論文〈歷史的負擔〉。¹⁵詹京斯在此強調布克哈特與懷特的主張極為神似，甚至有某

¹⁴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 136; 中譯本頁 229-230。譯文略有改動。

¹⁵ 關於懷特在此文中對布克哈特的討論，參見氏著，“The Burden of History,”

種理念上的傳承，雖不能說毫無道理，但筆者在本文開端所引用懷特在《後設歷史》中對於布克哈特的一段評論，其實已經點出：懷特在著書之時，對於布克哈特已有不以為然之處（「布克哈特對任何事物都持反諷的態度，甚至對自己也如此。他並不真正相信自己是認真的。」）；本文稍後也會簡短討論關於懷特對布克哈特是否始終抱持正面評價之問題。

總而言之，詹京斯對於懷特的詮釋，部分來自羅遜對於反諷主義的闡揚，部分根據懷特寫於不同時期的論文（如〈歷史的負擔〉）立論，却未考慮到羅遜與懷特兩人使用諷喻（或者反諷）的方式是否完全一致，以及懷特在不同時期所寫的論文與書籍，在立場上可能既有連續也有變異；這導致詹京斯最後難以解釋《後設歷史》究竟為何提出「超越諷喻」這個說法的嚴重問題。與詹京斯相較，本文以下的討論，雖然也會引用懷特的單篇論文，但將優先依照《後設歷史》的本文立論，希望能對懷特為什麼提出「超越諷喻」，以及《後設歷史》中諷喻觀念之用法問題，提供一些比較有根據的詮釋。

三、《後設歷史》中的諷喻觀念及其用法問題

（一）《後設歷史》中的諷喻觀念之負面意涵

懷特在《後設歷史》中，除了在結論的最後兩段話提到「超越諷喻」之外（見上引文），其實在序言裡就已經有所論述。懷特在〈序言〉的結尾如是說：

讀者不可能注意不到，本書正是採用了一種反諷模式。但是，點明反諷的反諷卻是有意識的，由此它代表了一種對抗

pp. 27-50, esp. p. 44; 中譯本：陳永國譯，〈歷史的負擔〉，頁 33-62，特別是頁 54-55。本文最初發表於 1966 年。

反諷自身的反諷意識的轉向。如果它成功地證明了當代史學思想中如此之多的懷疑論和悲觀論都根源於一種反諷式的心靈架構，並且，這種心靈架構僅僅只是人們在見到歷史文獻之前就能夠採取的諸多可能姿態中的一種，那麼，人們就能為拒斥反諷自身提供一些理由。¹⁶

為什麼諷喻(相對主義、懷疑主義、不可知論等)會與當代學院歷史學、客觀性等等這些可能在乍看之下完全不同(特別是從詹京斯的觀點來看)、甚至對立的體制與觀念聯結在一起？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參考懷特在《後設歷史》結論中的相關解釋：

史學思想在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步入的「歷史主義的危機」，無異於在各種替代性的解釋策略所認可的看待歷史的不同方式之間，無法在充分的理論基礎上做出選擇。¹⁷

懷特接著又說：

儘管當代學院歷史學持續侷限於在十九世紀晚期造成歷史主義危機的那種反諷式觀點。……一般歷史思想仍然繼續產生出挑戰反諷觀點的各種「歷史學」(historiology)體系。

現代歷史思想從兩方面攻擊這種反諷觀點。它[現代歷史思想]尋求克服它[諷喻觀點]的內在懷疑主義——[後者]當上了(passes for)學術上的謹慎與經驗主義，以及尋求克服它[諷喻觀點]的道德不可知論——[後者]當上了客觀性與超越意識形態的中立性。¹⁸

從上述解釋出發，懷特對於歷史學與諷喻之間關係的批評，大致可以引申綜述如下：當代學院歷史學所追求的客觀性與有限度的確定性，往往是立基於對於學院之外大環境的保持距離，迴避對人

¹⁶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xii; 中譯本頁 5。譯文略有更動。

¹⁷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431-432; 中譯本頁 591。

¹⁸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433; 中譯本頁 593。譯文多有更動。

類歷史大方向何去何從的問題表示意見，以及對於獻身於社會、政治行動的反對；而從懷特的觀點，這些盛行於歷史學界之內的思路與作法，表面上是追求客觀，實際上則是相對主義、懷疑主義、不可知論的展現。

以上的批評是針對學院歷史學的諷喻觀點；至於諷喻這種喻格在一般思想與行動上的作用，則還可以參考懷特在《後設歷史》的導論〈歷史的詩學〉中的另一段評論：

作為一種世界觀的基礎，反諷傾向於消解一切對於積極政治行動之可能性的信念。在反諷關於人類的狀況根本上是愚蠢的或荒謬的這種理解中，它傾向於產生一種文明自身處在『瘋狂』之中的信念，並且針對那些尋求以科學抑或藝術的方式把握社會實在之本質的人，產生了一種文官式的(Mandarin-like, 保守而清高的)蔑視。¹⁹

因此，懷特認為諷喻及其所衍生的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等問題，乃是當代學院歷史學中的主導性思考模式，需要加以抗拒。一味追求客觀中立的歷史學者，在懷特的理解裡，固然是一種諷喻主義者；至於完全放棄在歷史中尋找意義的思想家，恐怕更是諷喻主義最完整的展示，同樣不足為訓。懷特自認《後設歷史》本身也是一部諷喻主義的作品，但是透過這部作品對於諷喻本身的質疑，以及對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思想家的表揚(或者批評)，可以引導有志之士，開啟下一波對於諷喻的挑戰。相形之下，熱心提倡諷喻主義的詹京斯只看到懷特對於當代學院歷史學的批評，卻沒有看到：《後設歷史》將學院歷史學的問題視為諷喻之問題的一部分，而且對於諷喻本身有傾向於負面的評價。

¹⁹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38; 中譯本頁 49。譯文多有更動。

以上幾段引文，當然不是沒有費解之處，譬如：懷特說，諷喻的內在懷疑主義，在當代學院歷史學「當上了」(passes for)學術上的謹慎與經驗主義；那麼，「懷疑主義」與「學術上的謹慎與經驗主義」究竟是屬於同一種諷喻，還是應該有所區分？如果說，諷喻沒有進一步區分的必要，那麼，懷特對於《後設歷史》的自我定位(一種對抗反諷自身的反諷意識的轉向)是否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如果諷喻需要做出進一步區分，那麼，《後設歷史》到底是在何種意義下「採用了一種反諷模式」以作為一部諷喻主義的作品？筆者暫時擱置這些問題，在此先繼續以此書中的三個具體實例(馬克思、布克哈特、克羅齊)來說明：作為貫串全書的一個重要主旨，《後設歷史》如何呈現諷喻主義造成的問題，以及「超越諷喻」的可能途徑。

懷特在《後設歷史》中所表彰的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思想家，自黑格爾以降，大多致力於透過隱喻、轉喻、提喻等其它方式來構思歷史，以超越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之諷喻史觀(即過分強調光明與黑暗的對比，最後難免由極度樂觀轉向極度失望與虛無，如「歷史家不過是幫死人塗脂抹粉的化妝師」，「歷史本身沒有意義」等等)，尋求各種積極正面的答案。這種致力於「超越諷喻」的歷史思想家，可以馬克思為例。懷特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解釋以轉喻為主，而又結合了提喻：「馬克思的思想在兩者之間移動——轉喻的理解[適用於]人類在其社會狀態中的分裂處境，而提喻的暗示[適用於]他在整體歷史過程的終點所偵測到的統一。」²⁰換句話說，在馬克思的分析裡，人類社會的現在處境是悲觀的，但是人類有理由對於未來抱持著樂觀的看法；這正是馬克思歷史觀與諷喻史觀大相逕庭之處。

懷特也提到：雖然馬克思的歷史與社會分析中不乏諷喻的使用

²⁰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285; 中譯本頁 388。譯文略有更動。

(譬如以對比方式揭露勞動價值被貨幣價值所掩蓋之荒謬等)，但是在轉喻和提喻的雙重加持之下，馬克思所使用的諷喻只是一個輔助的分析手法。以商品價值的分析為例：馬克思藉由暴露資本主義社會與商品拜物教的荒謬，進而肯定勞動價值的真實，因此並不會出現「懷疑主義」、「學術上的謹慎與經驗主義」等各種諷喻之負面結果。²¹

然而，儘管懷特在《後設歷史》中對於馬克思有相當高的評價，卻仍留下如此感嘆：

馬克思自己的歷史概念絕不是反諷式的，但是他的確成功地揭示了每一種歷史概念的意識形態蘊涵。因此，他也為陷入反諷(the descent into Irony)提供了太充分的依據。²²

是以懷特認為，即使是看來相當成功地「超越諷喻」的馬克思，都還可能因為太過成功地揭露歷史的意識形態成分，挑戰了歷史學的自信，反而無意間為另一種趨勢(即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思想之「陷入諷喻」)鋪路。

至於《後設歷史》中所討論的「陷入諷喻」的歷史思想家，則以克羅齊最為徹底。簡而言之，懷特認為克羅齊的主張包含下列幾點：學習與研究歷史，應該避免自以為是地做價值判斷，簡單地肯定或否定某一時期，而應該從錯綜複雜的過去中，分辨出「什麼是活的」與「什麼是死的」；歷史學者的意見不要太強，對於所研究的過去也不要太熱心。懷特認為，克羅齊自己的歷史著作：

就像布克哈特的[歷史作品一樣]，全部是過渡式的、低調的、漸進式的、低度模仿的(low-mimetic)，並且也沒有什麼序幕或結局可言。……[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不是悲劇的，無論就其爆發或就其過程而論；它只是感傷的(pathetic)。克羅齊看待這

²¹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295-296; 中譯本頁 402。

²²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40; 中譯本頁 53。譯文略有更動。

場戰爭，正如同他看待戰前一個世紀的全部歷史，都是帶著一種反諷的感傷(pathos)。然而，這種感傷是溫和的。²³

這種淡漠溫和、超然世外的風格，正是克羅齊諷喻主義在歷史寫作上的表現。另一位風格相似、而諷喻程度稍次於克羅齊的歷史學家，要數懷特文中提到的布克哈特。懷特在《後設歷史》中對於布克哈特版本的諷喻主義之描述與評價為：布克哈特留戀於舊歐洲逝去的文化，將歷史當作避難所，以便遠離紛擾的現實；他寫的歷史只呈現舊文化的浮光掠影，而不提供完整的解釋，其本身就像是藝術作品，因此只能作為隱士沉思的對象，但不能提供任何實際行動的方向指引。不過，作為藝術史家的布克哈特，對於生命、藝術及舊文化確實有相當的熱情，這是他比起克羅齊還算稍微可取的地方。²⁴

以上簡介，是以馬克思、克羅齊、布克哈特三人為例，說明懷特的《後設歷史》所討論的歷史思想家，可以說是按照其思想、寫作方式與諷喻的關係加以定位：馬克思是致力於「超越諷喻」這一高貴目標的一員；縱然「超越諷喻」最後成為未竟之業，但是這樣的努力仍然受到懷特表彰。至於布克哈特與克羅齊則是「陷入諷喻」的代表，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懷特批評的對象。

然而，上文討論詹京斯對於懷特的詮釋時，曾經觸及一個問題：懷特在〈歷史的負擔〉與〈歷史闡釋的政治學〉兩篇論文中，可能有些與《後設歷史》不同的說法，而為詹京斯所依據。茲舉上述三位歷史思想家為例，對此問題作一些簡單的說明：在前述兩篇論文中，懷特本人對於布克哈特與馬克思這兩位思想家的態度，恰好並未一致，與《後設歷史》完全同調；而克羅齊在懷特心目中地位的前後升

²³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403-404; 中譯本頁 552-553。譯文略有更動。

²⁴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234-236, 250-251, 251-252; 中譯本頁 320-322、343-344、344-345。並參見本文開頭的引文。

降過程，其變化幅度之大，又更甚於布克哈特與馬克思。

首先，克羅齊的哲學與史學作品曾經是懷特早年所服膺的問學津梁。因此，在寫作《後設歷史》的十多年前，懷特還曾經感嘆克羅齊的思想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與懷特在《後設歷史》中對於克羅齊的嚴厲批評，幾乎是完全不同的態度。²⁵ 其次，本文上一節在介紹詹京斯《後現代歷史學》的相關部分時曾經提到：詹京斯根據懷特的論文〈歷史的負擔〉，認為懷特與布克哈特的歷史觀極為神似，甚至有某種理念上的傳承。詹京斯此說，由於只根據懷特〈歷史的負擔〉一文立論，因此有欠完整；但懷特在〈歷史的負擔〉（寫作時間稍早於《後設歷史》，初次發表於 1966 年）中，確實對於布克哈特有比較正面的評價，而與懷特在寫《後設歷史》之時所持的批評立場有所不同。²⁶

最後，馬克思在《後設歷史》中雖然獲得很高的評價，認為他的史觀遠離諷喻，能讓人類樂觀地期盼未來，但是在後來的論文〈歷史闡釋的政治學〉（初次發表於 1982 年）中，懷特卻批評馬克思主義與其所批評的資產階級歷史學一樣，都是「反烏托邦」的：

馬克思主義也是反烏托邦的，這是就以下情況而言的：它與資產階級歷史理論共同堅信，歷史不是一種崇高的景象(sublime spectacle)，而是一個可理解的過程。

每個人都承認，理解歷史的方式，對於決定一個人將會相信什麼樣的政具有現實性、可行性和社會性地負責，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往往被忽視的是：堅信一個人能夠理解歷史，與堅信歷史毫無意義，二種信念就其認識的說服力(epistemic plausibility)

25 Hayden V. White, "The Abiding Relevance of Croce's Idea of History," pp. 109-124.

26 參見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esp. p. 44; 中譯本頁 54-55; *Metahistory*, pp. 230-264; 中譯本頁 314-362。

而言，處在同一水平上。我的觀點是，一個人通過訴諸歷史能夠為之提供理由的那種政治，將會依據他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出發還是在後者的基礎上出發，而有所不同。我傾向於認為，一種具有願景的政治(visionary politics)只能在後者的基礎上出發。因而我下結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哲學，特別是作為一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無論它可能如何激進，在其作為一種歷史哲學方面，它並不比資產階級歷史哲學具有更多願景。²⁷

以上兩段引文，對於「歷史／過去本身沒有意義」這個諷喻主義的立場，不僅視之為認識論的出發點(與《後設歷史》的主旨相同)，而且還強調只有這個立場才能夠產生真正具有願景的政治，或真正的烏托邦主義(與《後設歷史》的主旨頗為不同)。從懷特的這個後期觀點出發，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願景就變得十分有限了。而詹京斯在《後現代歷史學》中討論懷特時，經常以〈歷史闡釋的政治學〉這篇論文的後期觀點為主要依據，來解釋懷特作為諷喻主義者的主張為何，以至於與懷特在《後設歷史》中的立場相去甚遠。²⁸

因此，如果就懷特的學術生涯而言，不僅他對於個別思想家的評價有所改變，甚至連他對於諷喻政治意涵的評價都顯得不盡相同：從《後設歷史》中認為諷喻「傾向於消解一切對於積極政治行動之可能性的信念」，不利於政治行動，到〈歷史闡釋的政治學〉中主張「一種具有願景的政治，只能在[堅信歷史毫無意義]的基礎上出發」，顯然是一個重要改變。不過，由於本文旨在討論懷特在《後設歷史》中的諷喻觀念，暫時不涉及懷特思想後續發展之常與變，因此筆者仍然

²⁷ Hayden White,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 pp. 58-82, quoted from p. 73; 中譯本：董立河譯，〈歷史闡釋的政治學——規範與非崇高化〉，頁 80-117，引文見頁 103-104。

²⁸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p. 138-144; 中譯本頁 230-241。

可以在此一限定範圍之內作出以下斷言：「超越諷喻」是《後設歷史》的一個重要主題，而諷喻在此書中基本上是在扮演具有負面意涵的角色；《後設歷史》的上述主旨，呈現了懷特學術生涯中一個特定階段的關鍵論點，並不會因為懷特本人日後思想的變化而隨之改變。²⁹

(二)《後設歷史》中的諷喻用法問題

雖然「陷入諷喻」以及「超越諷喻」是貫串《後設歷史》全書的重要主題，但是諷喻在書中的意義指涉同時有可能過於廣泛；以下將對《後設歷史》中對於諷喻的用法及其衍生問題作一介紹。

上文曾引述懷特在《後設歷史》序言結尾的一段話：「讀者不可能注意不到，本書正是採用了一種反諷模式。」³⁰儘管在本書中，諷喻經常是相對主義、懷疑主義(或懷疑論)、不可知論等負面字眼的同義詞，然而，《後設歷史》本身所採取的諷喻模式又是哪一種呢？或許讀者還可以再追問：《後設歷史》所採取的諷喻模式是否只有一種？

就筆者所見，懷特在《後設歷史》的結論中，試圖自行解釋，這本書是如何地「採用了一種反諷模式」：

[《後設歷史》] 宣稱在反思經典時期的史學思想時是價值中立的和純粹形式主義的(pure Formalist)。……我並不否認，我研究史學思想時的那種形式主義本身，反映了大多數現代學院歷史學在其中得以生成的反諷情形，但我認為，對於這種反諷性觀點的認知，為超越它提供了基礎。³¹

²⁹ 關於懷特在《後設歷史》之後的思想變化，參見 Wulf Kansteiner, "Hayden White's Critique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p. 273-295.

³⁰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xii; 中譯本頁 5。

³¹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433-434; 中譯本頁 593-594。譯文略有更動。

所以，按照懷特自己的解釋，《後設歷史》的「價值中立」與「形式主義」(Formalism)，「反映了大多數現代學院歷史學在其中得以生成的反諷情形」；此即這本書所採取的諷喻模式。但在筆者看來，懷特的解釋至少包含了兩種應該可以稍加區分的學術取向：「現代學院歷史學」及「形式主義」。前者的諷喻，按照懷特在結論的說法，表現於其「學術上的謹慎與經驗主義」以及「客觀性與超越意識形態的中立性」。³²後者則是吸引懷特的文學理論，主張作品的意義是由形式(form)之賦予所產生，而形式不只一種。此一主張如果應用在歷史著作上，意即：過去本身沒有意義，而意義都是由人所任意賦予的。這啟發了懷特在《後設歷史》中運用不同概念化層次(「編年」、「故事」、「情節化模式」、「論證模式」，以及「意識形態蘊涵模式」)來對歷史著作進行分析。³³筆者以為，《後設歷史》顯然既包含了形式主義的分析，又帶有現代學院歷史學的「價值中立」、「學術上的謹慎與經驗主義」等等。與其說這兩者是同一回事，不如說兩者並存於《後設歷史》之中。畢竟，現代學院歷史學的著作不見得都會像《後設歷史》一樣，有意識地採取形式主義的文學理論分析方法。

以上所述，只是《後設歷史》中關於諷喻之可能存在歧義的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筆者還可以再舉前面提過的馬克思、布克哈特、克羅齊等人的例子，來看懷特在討論這些歷史思想家時，會在哪些文章脈絡之下使用諷喻。首先，懷特論馬克思之時會說：「《資本論》首章的後半便是反諷的一種實踐。對於一切沒有基於理解勞動價值理論之真理的商品價值觀念，這一部份揭露出它們的純粹虛構本

³²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433; 中譯本頁 593。

³³ 懷特對形式主義的討論，參見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3-7, esp. p. 6; 中譯本頁 3-8，特別是頁 7。

質。」³⁴這裡的諷喻是一種對比。

其次，懷特論布克哈特時說：「布克哈特對任何事物都持反諷的態度，甚至對自己也如此。他並不真正相信自己是認真的。」³⁵這裡的諷喻是不認真、不嚴肅，拒絕獻身與承諾。稍後又說：

布克哈特向其讀者發言的聲音是反諷主義者的聲音，而反諷主義者具有一種比讀者自身所具有的更高、更憂傷的智慧。他以反諷眼光看待其研究對象，即歷史領域，認為它的意義難以捉摸、無法確定，唯有思維敏銳之人才能領悟；它太細緻而無法被囫圇吞棗(taken by storm)，太崇高而不容忽視。³⁶

懷特這段話裡的諷喻，除了涉及研究對象的微妙、難以捉摸之外，更涉及研究者 / 作者本身自視為高於讀者。

最後，懷特論克羅齊時，曾說克羅齊與布克哈特的風格與意識型態極為近似：淡漠溫和，拒絕下斷言或積極投入(見前引文)。至於克羅齊的哲學體系，因為是立基於對前人哲學思想的批判，熱衷於分辨前人思想中「什麼是活的」與「什麼是死的」，所以懷特也認為克羅齊這種自以為是的「判教」算得上是諷喻：「[克羅齊]以那種為偉大的犬儒派和狂人都共有的反諷的目光，看待當前以及過去的各種相互競爭的[哲學]體系。」³⁷這裡的諷喻又是一種對比與自視高人一等，而且還被形容為一種「偉大的犬儒派和狂人」所共有的特徵。

僅就以上三個歷史思想家的例子來看，諷喻的意涵已經包括：研究對象的微妙細緻；思考時所運用的對比、「判教」；寫作風格上的淡漠、憂傷、作者之高於讀者；及意識型態上的不認真、拒絕獻

34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296; 中譯本頁 402。譯文略有更動。

35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234; 中譯本頁 320。亦參見本文開頭的引文。

36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250; 中譯本頁 343。譯文略有更動。

37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379; 中譯本頁 518。譯文略有更動。

身與許諾等。若再加上前文提到的「現代學院歷史學」及「形式主義」，則《後設歷史》中諷喻意涵之豐富，就已相當可觀。

據筆者所知，首先指出《後設歷史》之中諷喻意涵過於豐富的評論者，應該是美國政治理論學者約翰·尼爾森(John S. Nelson)。早在1975年，尼爾森於《歷史與理論》期刊上發表的書評論文中，不僅明確指出《後設歷史》一書的主旨在於抗拒、超越諷喻，同時也批評懷特對於諷喻的界定不明，而使用過於廣泛。尼爾森分析：對於懷特而言，將歷史思想家歸類為諷喻主義者的隱含判準可以是：對於所研究的對象(人物，事件，主題)持部分批判態度；強調歷史上衝突矛盾之難解；對於研究對象作出否定的普遍評價；以及不相信從歷史抽繹出意義的可能性。³⁸簡單地說，從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從極度樂觀轉變為極度悲觀」的歷史觀，到當代學院歷史學的多談史實、少談價值，都在懷特的諷喻主義的大傘籠罩之下；甚至連幾位企圖運用其他喻格思維以超越諷喻的十九世紀歷史思想家，其作品也都有揮之不去、程度不等的諷喻陰影。如果諷喻是這樣地無所不在、無所不包，則「陷入諷喻」幾乎是必然的結果，而抗拒、超越諷喻恐怕也注定是不可能的任務。尼爾森在大體上接受懷特對於諷喻的負面評價，但是質疑懷特沒有把「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思想在逐漸向諷喻主義沈淪」的這個過程真正交代清楚。

對於懷特《後設歷史》中使用諷喻不夠嚴謹的問題，筆者以為懷特至少可以考慮下列幾種修改方式的可能性：一是參考尼爾森的區分，說明諷喻在不同層次上的運作，以及這些不同層次的諷喻如何彼此聯繫。其次，如果尼爾森以上所列舉的層次過於細密，則懷特也不妨從尼爾森批評的要旨著眼，針對十九世紀末「歷史主義的危

³⁸ John S. Nelson, "Review of *Metahistory* by Hayden White," pp. 74-91, esp. p. 81.

機」的諷喻(即「在各種替代性的解釋策略所認可的看待歷史的不同方式之間，無法在充分的理論基礎上做出選擇」)，如何演變為現代學院歷史學的諷喻(即「學術上的謹慎與經驗主義」，以及「客觀性與超越意識形態的中立性」)，作出更清楚的因果論證。

最後，研究懷特思想的新進學者赫曼·保羅(Herman Paul)近來提出另一種區分：「認識論的諷喻」與「意識形態的諷喻」。前者即認識到：過去本身沒有意義，而意義都是由人所任意賦予的；後者即布克哈特與克羅齊的意識形態：淡漠超然，與現實保持距離，甚至可能變成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保羅認為，懷特《後設歷史》序言所說的「對抗反諷自身的反諷意識的轉向」，其實就是藉由「認識論的諷喻」，來批判「意識形態的諷喻」，因為後者才是懷特真正不滿的對象。筆者認為：保羅的詮釋簡潔有力，為澄清《後設歷史》中的諷喻問題，提供可資採擇的方向。³⁹但是根據前文的介紹可以看出，《後設歷史》中「認識論的諷喻」與「意識形態的諷喻」兩者經常是如影隨形，難以切割。懷特主張的十九世紀末「歷史主義的危機」，導致當代學院歷史學所標榜的客觀中立，換句話說，就是「認識論的諷喻」導致「意識形態的諷喻」；而懷特對布克哈特及克羅齊的批評，往往同時包含意識型態與寫作風格、思路等各層次。因此筆者認為，保羅文中所說「認識論的諷喻當然不是懷特批評的目標」一語，還需要略加修改；如果這句話改為「認識論的諷喻不是懷特批評的主要目標」，或許比較不會引起誤解。⁴⁰而懷特若是願意接受保羅的詮釋，那麼懷特在書

³⁹ Herman Paul, "An Ironic Battle against Irony: Epistem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Irony in Hayden Whit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55-1973," pp. 35-44.

⁴⁰ Herman Paul, "An Ironic Battle against Irony," p. 37. 筆者以為，懷特將「認識論的諷喻」及「意識形態的諷喻」連結在一起而少有區分的處理方式，與黑格爾對於浪漫主義諷喻的批評頗有近似之處，而黑格爾很可能是懷

中所不時提出的對於「認識論的諷喻」的批評，或是類似「認識論的諷喻」導致「意識形態的諷喻」這樣的說法，就有大幅修改的必要。

四、轉接與重組——論懷特諷喻觀念之可能淵源

以上的討論，希望能夠指出兩點：《後設歷史》中的諷喻觀念基本上具有負面意涵，以及懷特對於此一觀念的使用過於廣泛。這兩點可以由以上所引尼爾森與保羅等人的相關文章得到印證，也剛好都是詹京斯的詮釋所沒有觸及的地方。不過，懷特為什麼會將諷喻觀念賦予負面意涵，則未為尼爾森及保羅等人所提及，仍然有待探討。其次，懷特所說的「以諷喻超越諷喻」，除了保羅所提出的合理解釋之外，是否還有可能從思想史的背景提供其他理解，也是筆者個人感興趣之處。因此，以下擬根據西方哲學史與文學批評史研究中對於諷喻觀念的一些討論，嘗試說明懷特相關思想的一些可能淵源，同時也藉此指出：詹京斯之詮釋所忽略的部份，其實在《後設歷史》與西方思想傳統中有不宜忽略的理論重要性。⁴¹

筆者謹就閱讀所及，將懷特的諷喻觀念之淵源簡單歸結為三部分：黑格爾與日耳曼浪漫主義者之間關於諷喻的論辯，特別是對弗列德里希·許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的批評；義大利思想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與美國獨立學者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對於諷喻的相關討論；

特思考諷喻觀念的一個主要淵源。

⁴¹ 在關於諷喻的諸多專著中，筆者特別受惠於兩本作品：Ernst Behler, *Irony and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Joseph A. Dane, *The Critical Mythology of Irony*. 前者以關於哲學界的討論為主，故未提及懷特；後者以關於文學批評界的討論為主，雖有討論懷特，但對其主要著作《後設歷史》著墨甚少，認識似有不足，就本文的關懷而言，仍略有可以補充之處。不過，本文所要補充說明的地方，實際上也都不出這兩本書所涵蓋的範圍。

以及加拿大文學理論學者諾斯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對於懷特的可能影響。

對《後設歷史》的讀者而言，上述第二個淵源可能最為明顯，因為懷特在《後設歷史》的導論中開宗明義，將諷喻列為四種喻格之一。對於諷喻概念曾經感到不解與好奇的《後設歷史》的讀者，可能會嘗試藉由探討喻格的意義來尋找答案，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花心思認真閱讀懷特在討論喻格時，所援引的兩位思想先驅維柯以及伯克的作品。譬如波蘭學者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在詮釋懷特如何尋求「超越諷喻」時，就認定懷特的相關見解來自維柯。⁴²至於懷特在討論「情節化解釋」(傳奇劇[Romance]、喜劇[Comedy]、悲劇[Tragedy]、諷刺劇[Satire])這另外一組概念時，還引用了弗萊。不過，無論是維柯或是伯克，似乎都不曾賦予諷喻任何不尋常的負面意義，與懷特的處理方式大相逕庭；至於弗萊的態度，相對而言比較負面，但是其所持理由與懷特頗有不同。如果要解釋為何諷喻在《後設歷史》之中如此負面，則答案的線索可能不在於為懷特在〈導論〉中所援引的維柯與伯克等人，而是「躲在亮處」，在於懷特在《後設歷史》之中闢有專章討論的黑格爾。因此，黑格爾對於浪漫主義的批判，構成筆者所強調的第一個淵源，並且是懷特賦予諷喻觀念負面意義時最關鍵的淵源。不過，弗萊與維柯的相關論點，經過懷特的重新組合之後，亦有助於說明懷特「以諷喻超越諷喻」這一主張如何形成。

(一) 黑格爾與日耳曼浪漫主義者之間的論辯

《後設歷史》討論黑格爾的專章，緊接在懷特關於啟蒙運動以及浪漫主義的討論之後，其副標題為：「歷史底詩學與超越諷喻之道」

⁴² Ewa Domanska, "Hayden White: Beyond Irony," pp. 173-181, esp. p. 180.

(The Poetics of History and the Way beyond Irony)。依照懷特的說法，啟蒙運動的歷史觀為諷喻主義所主宰，容易由極度的樂觀轉向極度的失望與虛無。浪漫主義者赫德雖然首先對啟蒙運動歷史觀與諷喻主義提出異議，但是並無妥當的解決方案。黑格爾應時而起，以其辯證的思考方式，將不同的喻格思維(如轉喻、提喻)整合入融貫的歷史觀中，因而真正超越了啟蒙運動史觀之唯諷喻主義獨尊的局面，為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思想開創了一個活力十足的黃金時代，一直到諷喻主義藉由學院化歷史學的興起而捲土重來為止。簡而言之，黑格爾在《後設歷史》中，扮演的是反抗諷喻主義獨尊局面的首位要角；懷特讚揚黑格爾(正如後來的馬克思)有充分能力駕馭諷喻，而不至於為其所支配。

揆諸歐洲哲學史，黑格爾的確曾經嚴厲地抨擊諷喻，不枉懷特的一番推崇；只不過黑格爾之所以抨擊諷喻，其原意並不在於批評啟蒙運動的歷史觀(如《後設歷史》所安排給黑格爾的位置)，而在批評日耳曼浪漫主義思想家許萊格爾以及其他浪漫主義者所揭櫫的美學主張。根據哲學史家與黑格爾學者泰瑞·平卡德(Terry Pinkard)對於這一段近代歐陸哲學史的解說，許萊格爾認為，人存在於一種基本的矛盾之中，既瞭解自身的有限，又仍然相信可能追求無限或超越自身限制。面對這樣難解的矛盾(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許萊格爾認為唯一的相應之道就是抱持著諷喻的態度：一方面肯定對於完整、絕對真理的追求乃是出於本能的要求，以及值得堅持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自我提醒，人所能理解掌握的真理可能永遠將只是局部的斷片。⁴³

然而，對黑格爾而言，許萊格爾的說法恰好是非破不可的俗說淺見。據另一位黑格爾學者麥可·英伍德(Michael Inwood)解說，黑格爾

⁴³ Terry Pinkard, *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 pp. 158-164.

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及諷喻，並區分蘇格拉底式的諷喻與許萊格爾的(或浪漫主義的)諷喻，而以後者為主要的批評對象，並且在《美學》的導論中陳述得最為詳細。⁴⁴黑格爾在《美學》中有如下批評：

[許萊格爾的]滑稽說更深的根源是菲希特的哲學……我們在這裡只需指出這一點：菲希特把「自我」——當然只是完全抽象的形式的「自我」——看做一切知識、一切理性和一切認識的絕對原則。……既然如此，自我就成為一切事物的主宰。

按照這個滑稽原則，當我的一切活動和一般的表現——就它們與任何內容有關而言——對於我只是一種顯現(外形)，它們所取的形狀完全由我支配時，我才是做為藝術家而生活著。所以無論是對於這內容，還是對於它的一般的表現和實現，我所抱的都不是真正嚴肅的態度。因為真正嚴肅的態度都起於一種有實體性的旨趣，一種本身有豐富內容的東西，例如真理、道德之類，這就是說，引起嚴肅態度的內容就它本身來說，對於我就是有實體性的，所以只有我沉浸在這種內容裡，在我的全部知識和行動裡都和這種內容吻合，我才感覺到我自身有實體性。如果按照滑稽說，藝術家就是自由建立一切又自由消滅一切的「我」。……如果照這樣看，這種嚴肅的態度就不能存在，因為除掉「我」的賦與形式作用以外，一切事物都沒有意義。⁴⁵

黑格爾在此指控許萊格爾的諷喻觀念(《美學》譯者朱光潛譯為「滑稽」)乃是對於菲希特(不完整的)主體哲學的一種簡單延伸，將自我恣意膨

⁴⁴ Michael Inwood, "Irony and Romanticism," pp. 146-150; Inwood, "Introduction," in Hegel,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Aesthetics*, pp. ix-xxxvi, esp. pp. xxviii-xxx.

⁴⁵ G. W. F. Hegel,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Aesthetics*, pp. 69-75; 中譯本：朱孟實(光潛)譯，《美學》，第1冊，頁77-83。引文出自頁78-80。

脹；從方法論的放縱，導向意識型態的虛無。其結果是既缺乏對於實體的基本尊重，又不會產生對於任何主題的真切關心與投入，而過度膨脹的自我也完全喪失目的與內容。所以諷喻主義者表面上看起來遊戲人間、玩世不恭，實際上卻內心空虛，又苦於不知如何才能解脫。黑格爾認為信奉許萊格爾諷喻觀的藝術家絕對無法創作出真正嚴肅感人的作品，而且，這種虛無態度的弊害也很有可能從美學以及藝術創作的領域蔓延到道德、法律等其他社會領域。⁴⁶

黑格爾對許萊格爾、浪漫主義與諷喻的了解與批評究竟公允與否，乃是若干當代歐陸哲學學者所關心的一個議題，惟因超出本文範圍，非筆者所能置喙。⁴⁷與本文相關的是，懷特對於諷喻的負面評價與強烈攻擊(特別是指控諷喻主義者，如布克哈特)的罪名為：不認真，自視高人一等，玩世不恭，至少可說是與黑格爾批評許萊格爾的論調如出一轍；若再考慮黑格爾作為批評浪漫主義諷喻首先發難者的歷史角色，應可推論懷特對於諷喻的負面評價是受到黑格爾的啟發。⁴⁸

⁴⁶ Michael Inwood, "Irony and Romanticism," pp. 146-150; Inwood, "Introduction," to Hegel,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Aesthetics*, pp. ix-xxxvi, esp. pp. xxviii-xxx; 參見 Hegel,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Aesthetics*, pp. 69-75; 中譯本頁 77-83。

⁴⁷ 據平卡德之說，若干當代德國哲學學者如亨利希(Dieter Henrich)、弗蘭克(Manfred Frank)等人已經開啟關於重新衡量浪漫主義思想在歐陸哲學傳統中地位的討論，參見 Pinkard, *German Philosophy, 1760- 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 pp. 136-137; 另參見 Ernst Behler, *Irony and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貝勒爾(Ernst Behler)是研究許萊格爾的權威專家。

⁴⁸ 懷特在《後設歷史》論黑格爾的專章中引用了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歷史哲學》及(特別是)《美學》，因此不可能不知道黑格爾對於浪漫主義諷喻的批評；懷特自己也曾經明言，對於《美學》的重視，乃是他對黑格爾歷史觀的詮釋與眾不同的地方之一。參見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85; 中譯本頁 114。先師錢新祖教授過去在課堂上討論此專章時，也曾特別推崇懷特結合黑格爾《美學》與《歷史哲學》的手法別出心裁。

若此推斷成立，則懷特將原本做為浪漫主義思想特色的諷喻，轉與啟蒙運動歷史觀(以及布克哈特與克羅齊)掛鉤，確有移花接木之嫌。

另一方面，從《後設歷史》的第一章來看，懷特對於啟蒙運動及浪漫主義歷史觀的詮釋，與黑格爾稍有不同，而是將批評焦點轉而聚集在啟蒙運動歷史觀之上；浪漫主義則只是企圖矯正啟蒙運動弊病的不成功之嘗試，本身問題不大。對於懷特而言，黑格爾所認定的浪漫主義諷喻觀的嚴重弊病：虛無、相對主義、「無所不可」、玩世不恭，更適合用來指責啟蒙運動的歷史觀(即誇大光明與黑暗的二元對立，最後難免導向失望與虛無的歷史觀)。這種對於諷喻的轉接或延伸使用於不同時代與思潮的作法，後來也出現在懷特從前的學生麥可·羅斯(Michael S. Roth)對二十世紀後半葉歐美思潮的針砭之中。他曾形容當代歐美思潮是陷入了「諷喻主義者的牢籠」(the Ironist's Cage)。⁴⁹由此可見，諷喻觀念的轉接挪用，已是一個持續發生的過程，而且懷特與羅斯對於此一觀念的挪用，都還不至於像詹京斯那樣，涉及「硬傷」的問題；因此，儘管懷特對於轉接挪用欠缺明白交代，有欠妥當，筆者以為這種轉接挪用的作法本身還是可以接受的。

在黑格爾與浪漫主義者的論辯之後，還有其他重要的歐陸思想家(如齊克果與尼采)對諷喻有所論述；就筆者閱讀所及，《後設歷史》並未提到齊克果，却有專章分析尼采，特別提到尼采在其早期著作《悲劇的誕生》中，將諷喻以及浪漫主義兩者當作批評對象，並將諷喻貶抑為一種屬於學者的特質，與懷特本人對學院史學的看法相當接近。⁵⁰當然，正如諷喻在《後設歷史》中包含了太多疑義，尼采對諷

⁴⁹ Michael S. Roth, "The Ironist's Cage," pp. 148-162.

⁵⁰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 333; 中譯本頁 454。Soren Kierkegaard, *The Concept of Irony*; 中譯本：湯晨溪譯，《論反諷概念——以蘇格拉底為主線》。雖然懷特於存在主義浸潤甚深，但是筆者尚未見到任何既有研究文

喻的使用與抨擊恐也不無問題，惟限於個人能力，無法在此深論。⁵¹

(二) 維柯與伯克

前文指出，懷特在《後設歷史》中賦予諷喻觀念負面意涵，很可能是主要受到黑格爾的啟發。但懷特將諷喻置於四個主要喻格之中，則又是懷特結合其他思想家見解而加以重新詮釋的結果。筆者將在下文繼續交代。不過，以下關於維柯的討論，乃受到約瑟夫·丹恩(Joseph A. Dane)的啟發，不敢掠美，在此慎重聲明。⁵²

首先是維柯。懷特在〈歷史的轉義學〉一文中，企圖對維柯《新科學》第1卷〈一些原則的奠定〉中的一個定理：「觀念(思想)的次第必然要跟隨各種事物的次第」(The order of ideas must follow the order of things)，提出一套自己的詮釋。在發表此文之前，懷特於《後設歷史》中討論布克哈特專章的開端也已對此簡略說明。⁵³丹恩指出：「觀念的次第」與「事物的次第」兩者之間的變動應該如何對應，就是懷特對於維柯的詮釋特別之處。⁵⁴

獻將齊克果列為影響懷特的重要人物；例如多曼斯卡即曾列舉懷特於1973年以前作品中經常引用的三十多位學者與思想家，而齊克果則未預其列。參見 Ewa Domanska, "Hayden White: Beyond Irony," esp. p. 174.

⁵¹ Richard Lowell Howey, "Some Reflections on Irony in Nietzsche," pp. 36-51.

⁵² Joseph A. Dane, *The Critical Mythology of Irony*.

⁵³ 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pp. 70, 129-132; 中譯本：朱光潛譯，《新科學》，頁168、240-244。Hayden White, "The Tropics of History: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New Science," pp. 197-217, esp. p. 198; 中譯本：張萬娟譯，〈歷史的轉義學——《新科學》的深層結構〉，頁193-215，特別是頁194。本文於1976年初次發表。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230-231; 中譯本頁314-315。

⁵⁴ Joseph A. Dane, "Viconian Ironies," pp. 159-171, esp. pp. 159-165.

在介紹懷特的詮釋前，筆者先簡單回顧維柯本人的相關討論。關於「事物／制度的變動」的部分，維柯在《新科學》第4卷〈諸民族所經歷的歷史過程〉及第5卷〈各民族在復興時所經歷的各種人類制度的復歸過程〉中，將「事物／制度的變動」分為三個階段：「眾神的時代」(the age of gods)、「英雄的時代」(the age of heroes)、「與「眾(男)人的時代」(the age of men)。第三階段會走向道德相對主義及信仰上的懷疑論，以致於凝聚社會的基礎瓦解；這個社會如果不是透過吸收新文化取得新生命力，就是自我毀滅，或是被新興勢力取而代之。而新興勢力也同樣會再次經過這由原始到文明必經的三個階段。⁵⁵

至於「思想／觀念的變動」部分，維柯曾在《新科學》第2卷〈詩性的智慧〉(即仍處於原始狀態的社會之認知方式)中第二部分〈詩性邏輯〉裡面提到：詩人(原始社會的智者)在認知世界的時候，經常使用最具體的感性意象來替事物命名，而命名方式是透過提喻與轉喻來進行，譬如將自然力量與事物神格化，或視為神意的一部分。如果需要把個別事物提升到共相之時，則需要發展出隱喻(這是最普遍的作法)。最後，當原始社會的人能夠進行反思，超越詩性智慧的限制時，會開始使用諷喻，質疑過去的認知方式之真實性。從此，人類不再只會使用詩性的語言，而會開始使用散文式的語言。

對於諷喻，維柯認為：「暗諷(Irony)當然只有到人能進行反思的時候才可能出現，因為暗諷是憑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⁵⁶所謂「暗諷是憑反思造成貌似真理的假道理」，是對比於原始社會人類完全相信詩性語言與傳說故事的真實性而言。⁵⁷因為在原始社會進行文

⁵⁵ Hayden White, "The Tropics of History: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New Science," pp. 200-201; 中譯本頁 196-197。

⁵⁶ 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p. 118; 中譯本頁 242。

⁵⁷ 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p.118; 中譯本頁 243。

明化的成長過程中，伴隨著諷喻的複雜思維方式而出現的，有詐偽、反思能力、關於真假之別的認知。但在維柯的思想裡，所謂「原始」、「文明」都是各自時空的產物，難有高下之分，因此維柯在討論諷喻的出現時，並無藉機下任何價值判斷的跡象。⁵⁸

但是，當懷特引用維柯這段原本侷限於原始社會的詩性智慧的討論時，卻是將這四種詩性智慧的喻格，延伸應用到人類社會從原始到文明必經的三個階段，以重新詮釋維柯所說的「觀念(思想)的次第必然要跟隨各種事物的次第」。按照懷特的說法，維柯在語言意識與歷史進程之間作出「嚴密的類比」：四種喻格之間的轉換過程(從隱喻到轉喻，從轉喻到提喻，從提喻到諷喻)，分別對應「眾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與「眾(男)人的時代」。⁵⁹

懷特的上述詮釋，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首先，維柯本人是否作出這個語言與現實之間的「嚴密的類比」，如懷特在此所說，恐怕不無疑義。因為對照以上關於《新科學》相關內容的回顧，懷特其實是將維柯原本所說侷限於原始社會的詩性智慧，擴大運用並對應於整個文明化的歷史進程；這樣的詮釋是懷特對維柯原文的一種延伸，雖然不一定有對錯可言，但是其為引申發揮的性質，則是懷特自己在其他文章中也承認的。⁶⁰

⁵⁸ 關於維柯的思想要旨，參見郭博文，〈維柯的社會哲學〉，頁 9-53。

⁵⁹ Hayden White, "The Tropics of History: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New Science," pp.203-209; 中譯本頁 200-206。惟譯者在頁 206(對應於原文 pp. 208-209)有相當嚴重的漏譯。

⁶⁰ 懷特在另一篇文章〈歷史的闡釋〉的一個註腳中，承認維柯並未明文提出這種對應關係，儘管懷特辯稱這是可以從維柯思想中推論而得的結果。參見 Hayden Whit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p. 51-80, esp. p. 80, n. 42; 中譯本：陳永國譯，〈歷史的闡釋〉，頁 63-100，特別是頁 96 的註。對於懷特詮釋維柯的方式，參見 Joseph A. Dane, "Viconian Ironies," pp. 159-171,

其次，由於歷史進程的第三個階段，「眾(男)人的時代」，是維柯所說的，社會因為相對主義與懷疑論盛行而走向衰微的時代；而懷特再將諷喻安排為這個衰世的思考方式(其內容等同於相對主義與懷疑論，為反思活動的極致結果)，這就賦予諷喻相當負面的意義。這恐怕也是維柯原來所沒有明確提出的說法。

第三，丹恩指出：維柯原本的分析中，隱喻、轉喻、提喻這三種喻格並無時間上或邏輯上的先後次序，只有諷喻確定會在原始社會的最後階段出現。可是，經過懷特的歷史化詮釋，這四種喻格的先後次序不但固定，且被套用在歷史進程之上(或就《後設歷史》的主題而言，是套用在歷史意識演變的進程之上)，成為一個循環或螺旋的過程。⁶¹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儘管懷特受到維柯的影響，這份影響卻是經過懷特自身的詮釋而產生作用。懷特將諷喻置於四個主要喻格之中，當然是承襲自維柯；但懷特將諷喻賦予負面意涵，則是轉接了黑格爾的批評，而非維柯原有的見解。至於懷特將這四個喻格視為一個反覆發生的循環或螺旋過程，雖非直接承襲維柯之說，但仍可視為對維柯思想的一種發揮。據此，懷特之所以提出「以諷喻超越諷喻」，也可以解釋為：由於懷特認為自身所處的時代，正是這個循環或螺旋過程的末端，一切思維方式(包括對於這個時代本身的不滿)都無法不受諷喻的影響，因此「以諷喻超越諷喻」也就成為此一階段不得不爾的反抗途徑。不過，由於懷特在《後設歷史》中並未明確解釋四個喻格所構成的循環或螺旋過程，因此必須比照懷特對維柯的重新詮

esp. pp. 159-160. 比較 Ewa Domanska, "Hayden White: Beyond Irony," p. 180.

⁶¹ Joseph A. Dane, "Viconian Ironies," pp. 159-171, esp. pp. 159-165. 不過，丹恩認為懷特在《後設歷史》中不但將這四種喻格當做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意識演變的進程，同時也當做十九世紀歐洲史的實際進程，以至於將書寫的歷史等同於實際的歷史(pp. 161-162)；筆者認為這個批評並無依據。

釋，才能看出大概。

在討論維柯之後，以下繼續考察肯尼斯·伯克如何討論諷喻。懷特所引用的伯克作品《主題的文法》(*A Grammar of Motives*, 1969[1945])，其主旨是以戲劇形式及其各種要素來分析現實世界的各種被視為天經地義的運作方式、語彙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為懷特《後設歷史》的類似作法導其先路。⁶²與本文有關的諷喻，則是出現在《主題的文法》的附錄 D〈四個主要喻格〉；伯克在此將隱喻、轉喻、提喻、諷喻這四種喻格視為具有發現並且描述真實之能力的四種主要思維方式。⁶³在四者之中，伯克又將諷喻稱之為「辯證的」，視之為讓一整齣戲劇或社會情境完整進行與呈現的思想建構方式，以求在眾聲喧嘩的一齣戲中依然傳達出一個整體性，也可以說是達到了「關於眾多觀點的一個觀點」(a “perspective of perspectives”)。⁶⁴

「諷喻辯證」是伯克所表彰的理想，但不易達成或維持。伯克指出諷喻必須抗拒的幾種誘惑：其一即為相對主義，讓戲劇／社會情境迷失於眾聲喧嘩中，變得支離破碎。另一種誘惑是「法利賽人式的誘惑」(a Pharisaic temptation)，即自以為高人一等(superiority)。伯克在此將「浪漫主義的諷喻」(romantic irony, 也就是黑格爾的批判對象)歸類為這種「法利賽人式的誘惑」下的產物，而不認為是真正的諷喻。伯克說：

當然，有一種諷喻，稱作「浪漫主義的諷喻」，可能適合這種模式——這種諷喻事實上是起自針對文化腓利士主義(cultural philistinism, 市儈庸俗)的一種美學上的反對，藝術家在這對立關係中認為自己既外在於、又優越於其所排斥的角色。

⁶² Kenneth Burke, *A Grammar of Motives*, p. xv. 關於伯克的思想輪廓，特別是其社會、政治面向，參見 Frank Lentricchia,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

⁶³ Kenneth Burke, “Appendix D: Four Master Tropes,” pp. 503-517, esp. p. 503.

⁶⁴ Kenneth Burke, “Appendix D: Four Master Tropes,” pp. 511-513.

然而，真正的諷喻，那確實可以承當「謙遜自制」(humility)特質的諷喻，不是「優越於」敵人。……真正的諷喻，謙遜的諷喻，是基於一種與敵人有基本親屬關係的感受。……這正是福樓拜的諷喻，當他認出包法利夫人就是他自己。⁶⁵

所以，真正的諷喻(伯克又稱之為「辯證的諷喻」，dialectic irony)應該是謙遜自制(humility)，而不是在面對文化腓利士主義之時，以古希伯來法利賽人的高姿態來凸顯自己的優越；而後者只能歸屬於「浪漫主義的諷喻」，不是伯克所同意與表彰的諷喻。

以上簡介伯克對於「真正的諷喻」的讚許看法及必須抗拒的誘惑之後，再回過頭來看懷特對於伯克的相關討論。懷特在解釋諷喻(作為「否定式的」，具有懷疑論等負面意涵)的時候，明文提到了伯克的相關說法(諷喻是「辯證的」)。⁶⁶不過，耐人尋味的是，懷特在此企圖將伯克原先對於諷喻的正面評價，銜接整合到懷特的「否定式」新說法裡面：

這樣，反諷就代表著意識的一個階段，在其中語言本身那種成問題的性質已經被認識到了。它指出了所有關於現實的語言描述之潛在愚蠢，也指出了它所嘲弄的那些信念[筆者按：即相信語言可以描述現實]之荒謬性。因而，像肯尼斯·伯克注意到的，反諷是「辯證的」，雖然這種辯證性質展現在反諷對世界進程的理解上的程度，不如展現在其在對語言的能力之理解上；而反諷對於語言能力的辯證了解是：在任何語詞圖像的行動中，語言製造的模糊，多過於它所能澄清的。⁶⁷

⁶⁵ Kenneth Burke, "Appendix D: Four Master Tropes," p. 514.

⁶⁶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37; 中譯本頁 48。此外，懷特在解說黑格爾思想中的戲劇情節結構時，也提到上述伯克的觀點，參見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94; 中譯本頁 127。

⁶⁷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37; 中譯本頁 48。譯文多有改動。

經由對比伯克與懷特兩人對於諷喻之討論，讀者應可明顯看出兩種其實是非常不同的、一正一負的理解方式：伯克的「辯證的」諷喻，是呈現戲劇與社會情境整體性的理想方式；而懷特所說「否定式的」諷喻，則是質疑語言能夠描述或再現現實的能力，是懷疑論的一種形式，也是《後設歷史》所要批評的對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懷特在上述引文中如何處理他與伯克的差異。懷特的意思其實是說：伯克所說的「諷喻辯證」展現在「對世界進程的理解上」；但更應該注意的辯證，是懷特自己所要強調的，「不如展現在其在對語言的能力之理解上」的否定式思維，也就是質疑用語言描述現實的可能性。不過，懷特在《後設歷史》出版時所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歷史的闡釋〉中，甚至放棄收編整合伯克「諷喻是辯證的」這個說法的企圖，改而含蓄地質疑伯克：「伯克認為，反諷本來就是辯證的，……我不知道情況確否如此。」⁶⁸

經過以上比對，筆者可以斷定：懷特不是因為看不懂伯克對「諷喻辯證」的正面評價(戲劇的整體性、謙遜自制等等)而鄧書燕說，把伯克硬拉入自己的支持者陣營，而是在《後設歷史》自身特殊綱領(要以諷喻標示西方歷史思想朝向懷疑論的沉淪)的前提，以及懷特在構思喻格理論的其它方面時確曾受到伯克之啟發的狀況下，企圖淡化自己與前輩之間的對立，將兩人之間的差異繼續加以某種銜接。只是懷特的這一整段話，太容易讓未必讀過伯克作品的《後設歷史》讀者誤以為這全部都是伯克本人的說法，可以毫無保留地用來支持懷特。⁶⁹

⁶⁸ Hayden Whit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 73; 中譯本頁 97。懷特這篇文章是將《後設歷史》的導論改寫，而單獨在期刊 *New Literary History* 發表，第一次發表時間是在 1972-1973 年。

⁶⁹ 例如《史元》中譯者劉世安即將懷特與伯克的不同立場合而為一，見劉世安，〈導讀〉，頁 xxii。

(三) 弗萊

以上討論的幾種諷喻思想淵源，都是經由懷特自己有意識的詮釋與轉接之後，在《後設歷史》發揮作用；對於懷特所徵引的另一位文學理論家諾斯羅普·弗萊，筆者也作如是觀。

首先，相對於維柯的中性描述與伯克的正面評價，弗萊對於諷喻抱持著比較持負面的看法。根據美國文學批評學者法蘭克·蘭崔嘉(Frank Lentricchia)的解釋，弗萊自己深受德國美學人文主義(以康德、席勒為代表)影響，相信人所能取得的內在自由程度，取決於人所能體驗美感的能力或程度。從這個基本信念出發，弗萊在其《批評的解剖》所分析的四種敘事結構中，偏好傳奇劇與喜劇，而較不欣賞諷刺劇與悲劇；因為前二者的正向劇情發展，能讓讀者與主角一起體驗精神的自由超脫，而後二者只會提醒讀者外在環境或現實如何無奈與沉重。至於弗萊所說作為五種「讀者——角色」關係模式最後一種的「諷喻的模式」(Ironic mode)，介紹給讀者的是連一般人都不如的「反英雄」(anti-hero)，更無法像其他幾種關係模式(分別介紹神話英雄、傳奇人物等)那樣，有提升精神自由的作用。⁷⁰弗萊解釋道：

低準則(low-norm)的小人物自貶者(eiron)是諷刺作品(irony)用以替代英雄的；如果英雄在諷刺作品(satire)中被移開，我們便能更清楚地見到，其敘事結構(mythos)的中心主題之一是英雄行為(the heroic)的消失。⁷¹

⁷⁰ Frank Lentricchia, "The Place of Northrop Frye's *Anatomy of Criticism*," pp. 2-26, esp. pp. 20-24. 相反地，丹恩認為弗萊把諷喻既放在五種「讀者——角色」關係模式中的最後一種，又處於四種敘事結構的最後一種，是有意抬高諷喻的地位。筆者認為丹恩之說不如蘭崔嘉的解釋來得準確。參見 Joseph A. Dane, *The Critical Mythology of Irony*, p. 167.

⁷¹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 228; 中譯本：陳慧等

另一方面，弗萊雖然指出諷喻與無奈、沉重的連帶關係，但是他並不以無奈、沉重為其相關分析的結尾：

第六相位(phase)的諷刺(irony)是用基本上無法緩解的奴役束縛(bondage)來展現人生的，其背景主要為監獄、瘋人院、施私刑的暴徒、行刑的法場等……。在當今時代，這一相位的主要形式是社會暴政造成的恐怖感，《一九八四》大概是我們最熟悉的例子了。……但是，過了這個令人厭惡的象徵毀滅和愚昧的世界，也即在這個毫無憐憫、毫無希望的世界的另一面，諷刺(satire)又重新開始了。但丁筆下地獄的底層即是地球的中心，在那裡，但丁見到撒旦直挺挺地站在四周都是冰的地方；當他跟隨維吉爾……通過中心，忽然發現自己不再向下而是向上爬動。……從這一角度看，撒旦就不再是站著，而是頭向下倒立，當初它從天堂被扔到地球那一邊時正是這個姿態。悲劇和悲劇性嘲諷把我們帶進一個包圍在裡三圈外三圈中的地獄，……悲劇無法帶領我們繼續前進；但是，倘使我們能繼續探索嘲弄和諷刺的敘事結構，那麼我們就會通過一個死亡的中心，最後見到紳士派頭的黑暗王子頭衝下倒栽著的形象。⁷²

因此，在弗萊的分析中，諷喻(或「悲劇的諷喻」)有其沉重的一面，但是並非完全絕望。

弗萊的相關分析，稍後會出現在懷特《後設歷史》中討論布克哈特專章的開端，被懷特用來接續對維柯及黑格爾有關諷喻的討論之後，以深入說明諷喻的負面作用：失去英雄，無法期待快樂的結局。但是懷特在引用弗萊的分析時，並未提到弗萊期盼透過諷喻「最後見

譯，吳持哲校譯，《批評的解剖》，頁 333。譯文略有更動。

⁷²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p. 238-239; 中譯本頁 348-350。譯文略有更動。

到紳士派頭的黑暗王子頭衝下倒栽著的形象」的一線光明希望，而是又加上了自己對於諷喻的負面詮釋：

反諷發展的情境是，人們認識到在實在的過程和任何對這些過程的言辭描述之間存在著致命的不對稱。……既然反諷被剝奪了一切「幻想」，它也就失去了對「本質」自身的一切信念。這樣，反諷最終傾向於文字遊戲(word play)，傾向於成為語言的語言，以便使語言自身造成的意識符咒得以化解。……最後，反諷把世界想像成陷入了一個語言製成的牢籠，想像成一個「象徵之林」。它看不出有什麼道路可能走出這個森林，因此它滿足於毀掉一切規則、一切神話，只為了純粹的「沉思」和聽任順從於「事物如其所是」的世界。⁷³

若將懷特上述對諷喻的詮釋，對照弗萊自己側重於其束縛效果的解說，不難發現其間差別：懷特所認定的諷喻負面意涵包含了「文字遊戲」，滿足於生活在「語言製成的牢籠」，都與弗萊原有的主張相左。

至於弗萊引用但丁《神曲》中的意象，認為諷喻的意涵如果推到極致，最終可以幫助受到束縛的人們看清束縛本身之可笑，這個說法對於理解懷特在《後設歷史》序言與結論末尾所提出的「以諷喻超越諷喻」，應該可以提供一些啟發。不過，懷特在全書的絕大部分，都沒有明白提出諷喻具有像弗萊所說的物極必反、自我顛覆的可能性，或者有哪一位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家順利完成了這種自我顛覆。懷特可以接受馬克思偶爾使用的諷喻具有一些進步作用，那是因為他認定馬克思歷史觀的主軸與諷喻相去甚遠，因此不符合弗萊所描述的「物極必反」的狀況。至於克羅齊與布克哈特這兩位諷喻主義的代言人，雖然符合「極」的條件，但是未必能夠「反」，所以無法得

⁷³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232-233; 中譯本頁 317-318。譯文略有更動。

到懷特「以諷喻超越諷喻」的好評。就筆者所見，在《後設歷史》所分析的思想家中，要以尼采的思想路數最具自我顛覆的可能，但懷特最終還是質疑尼采神化(deify)了唯美主義的歷史概念，也等於陷入更深的虛無主義，不能算是成功的例子。⁷⁴

另一方面，作為弗萊的讀者，懷特不僅應該知道，而且也有可能隱含地承認了弗萊對於諷喻的部分肯定；但是即便如此，懷特也僅止於在《後設歷史》的序言與結論末尾作出一些可能是呼應弗萊說法的回響，主張(而非論證)「以諷喻超越諷喻」是可能的，以作為這本書的自我定位。換句話說，懷特在書中並未明白確認這一點。依筆者之見：如果懷特真的明白承認諷喻有任何潛在積極作用，那麼他等於是把這種積極作用只保留給自己，自處未免太高(參見懷特對克羅齊的批評)。更重要的是：懷特主要的批評對象是克羅齊(以及布克哈特等人)，如果他在嚴厲批評克羅齊等諷喻主義者之餘，還慷慨地對諷喻的潛在積極作用加以表揚，難免自我削弱了批評的力道；這是為什麼《後設歷史》中的諷喻的負面意涵會被懷特一再強調，而任何潛在積極作用都會被淡化處理的原因。

綜上所論，筆者認為：雖然弗萊與懷特兩人都認為諷喻基本上

⁷⁴ 相較於對尼采的評價，懷特在寫作《後設歷史》時顯得更欣賞黑格爾。參見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 371-374; 中譯本頁 508-512。不過，尤金·哥洛布(Eugene O. Golob)曾批評懷特的思想路數實際上與尼采無異，同樣走上極端的虛無主義，只是為了掩人耳目而與尼采保持距離。參見 Eugene E. Golob, "The Irony of Nihilism," pp. 55-65。其它論及懷特與尼采具相似處之例，亦參見 John S. Nelson, "Review of *Metahistory* by Hayden White," pp. 88-90; Lloyd S. Kramer,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pp. 125-126; 中譯本：〈文學批評與歷史想像——懷特與拉卡頗的文學挑戰〉，頁 181-183。這個議題值得繼續追蹤，但限於學力，仍待日後深論。

具有負面意涵，且懷特受到弗萊影響乃是無庸置疑。但若根據以上對於弗萊及懷特相關論旨的對比以及蘭崔嘉的解釋，則弗萊不欣賞諷喻的理由，主要是因為諷喻提醒讀者外在環境或現實的束縛；這與懷特在《後設歷史》中認為諷喻還會導致懷疑論（「文字遊戲」等），其實頗有不同。⁷⁵因此，單就懷特《後設歷史》中認為諷喻具有特殊的負面意涵（導致懷疑論、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這一方面而論，以黑格爾對於諷喻的批評作為懷特的主要思想淵源（或者說，黑格爾的批評最符合懷特此時的需要），仍然會比訴諸弗萊或其他人更為適合。至於懷特「以諷喻超越諷喻」的想法，除了（經過懷特重新詮釋的）維柯循環觀之外，也有受弗萊影響的可能，故或許隱含承認諷喻可能具有部分積極作用；但由於懷特刻意淡化這一點，這方面的影響也就變得隱而不彰。

五、結論

經過以上的介紹與解釋，希望對於懷特《後設歷史》中所涉及的諷喻觀念有所澄清。簡而言之，懷特以諷喻作為布克哈特、克羅齊、以及當代學院歷史學的特徵，恐怕是一個過於含糊籠統的指控，難以讓專業歷史學者心服。但是《後設歷史》中的諷喻觀念，本身有其複雜性，仍然值得思想史學者加以關注；這個觀念在西方思想傳統之中有其來龍去脈，更在《後設歷史》中經由懷特的轉接與重組，構成了全書一以貫之的主題：十九世紀歐洲歷史思想的「陷入諷喻」及對於此一困境之超越。

懷特在《後設歷史》中闡述自己對於諷喻的理解時，經由有意識

⁷⁵ 不過，懷特後來在〈歷史闡釋的政治學〉中，以烏托邦主義為標準來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不能提供充分的願景（見前文），倒是與弗萊在《批評的解剖》中對於諷喻的批評（即讓人有束縛之感）更為接近。

地挪用轉接前人的思想(如黑格爾、維柯、伯克、弗萊)而形成自己的架構。這種轉接與重組工作的成果，讓《後設歷史》中的諷喻觀念具有至少兩個明顯的特徵：觀念循環或螺旋的末端，以及具有負面意義(至於諷喻所可能具有的潛在正面意義，則被淡化處理)。經由對於維柯的詮釋，懷特將隱喻、轉喻、提喻、諷喻四個喻格視為一個循環或螺旋，在諷喻所代表、懷疑論瀰漫的末世之後，終將有一個新的開始；這個循環或螺旋成為懷特相信「諷喻終將自我毀滅並且被超越」的依據，而且懷特也相信《後設歷史》「以諷喻超越諷喻」的作法可以幫忙促成這個新循環或螺旋的早日來臨。至於諷喻之所以會變成代表懷疑論瀰漫的末世思想，並未見於維柯本人主張，而是懷特挪用轉接了黑格爾對於浪漫主義諷喻之批評的結果；這應是《後設歷史》在構思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為了強調諷喻在大多數時刻所具有的負面意義，懷特不僅刻意排除了伯克對於「真正的諷喻」的正面評價，甚至也略過了弗萊所期盼諷喻會在最後一刻自我顛覆的可能性不提。

詹京斯對於懷特諷喻觀念的了解，則完全省略上述這兩個特徵。詹京斯眼中的懷特，因為堅定主張「過去本身沒有意義」，故與羅遜的反諷主義(即現實「是可以無限地予以重新描述的」)若合符節。但是，從本文對於《後設歷史》的回顧與分析來看，「過去本身沒有意義」這個立場雖然是《後設歷史》的認識論起點，卻不是其意識型態或政治主張的終點。《後設歷史》的主旨之一是「超越諷喻」，但詹京斯對於這點就顯得十分隔閡，因而無法提出適當的解釋。

如果詹京斯對懷特的詮釋有過於簡化之嫌，那麼詹京斯對於他的另一個重要思想資源羅遜的反諷主義是否做了充分的呈現，或也不無疑問。雖然本文無力在此繼續追究羅遜是如何構思他的反諷主義之過程，但是羅遜的批評者之一貝勒爾曾經指出：羅遜在列舉反諷主義先行者的系譜時，將黑格爾與海德格包含在內，從歐陸哲學

史的觀點來看，可能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地方。⁷⁶如果要對羅遜思想有比較完整的了解，則深入分析羅遜反諷主義的來龍去脈，應該也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所以，詹京斯可能在無意之間開啟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懷特所說的諷喻與羅遜的反諷主義是否有可以相比附之處。但是，這個問題應該以比詹京斯之現有論說更為嚴謹的方式加以探討。如果學者願意繼續探討這個問題，則從懷特這方面而論，或許可以先從釐清懷特在《後設歷史》中對於諷喻的循環觀與負面評價作為開始；這是本文所能提出的一點建議。⁷⁷

(本文於 2011 年 4 月 21 日收稿；2011 年 10 月 3 日通過刊登)

*感謝宋家復教授、《新史學》諸位匿名審查人及編輯委員對於本文初稿所提出的批評與修改意見。本文為筆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從懷特到詹京斯：關於『後現代史學』與諷喻 / 反諷的一個個案分析」(計畫編號：96-2411-H-260-012)研究成果，寫作期間承蒙王大綱、張月姝、錢羿杏、陳哲維等同學多方協助，特此誌謝。

⁷⁶ Ernst Behler, *Irony and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p. 142-143. 其它對於羅遜反諷主義批評之例，可見 Michael S. Roth, "Thin Description: Richard Rorty's Use of History," pp. 113-136.

⁷⁷ 懷特在接受多曼斯卡訪談時，批評羅遜有族群、階級、性別的偏見，過於族群中心(ethnocentric)。參見 Ewa Domanska ed.,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p. 33; 中譯本：彭剛譯，《邂逅——後現代主義之後的歷史哲學》，頁 39。不過懷特在此只是發表感想，並非提出有系統的分析。關於懷特和羅遜在思想架構與社會、政治實踐上是否可能仍有相容與互補之處，仍待深入探討。

徵引書目

- 埃娃·多曼斯卡編，彭剛譯，《邂逅——後現代主義之後的歷史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李鑑慧，〈知者無罪——海登懷特的歷史思想〉，《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2 (臺北，2003)，頁 1-55。
- 諾思羅普·弗萊著，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吳持哲校譯，《批評的解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 羅伊·克拉瑪，〈文學批評與歷史想像——懷特與拉卡頗的文學挑戰〉，收入林·亨特編，江政寬譯，《新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 147-185。
- 索倫·奧碧·克爾凱郭爾著，湯晨溪譯，《論反諷概念——以蘇格拉底為主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郭博文，〈維柯的社會哲學〉，收入郭博文，《社會哲學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2000，頁 9-53。
- 黑格爾著，朱孟實(光潛)譯，《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81。
- 凱斯·詹京斯著，賈士衡譯，《歷史的再思考》，臺北：麥田出版，2008。
- 凱斯·詹京斯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遜與懷特》，臺北：麥田出版，2000。
- 維科著，朱光潛譯，《新科學》，臺北：駱駝出版社，1987。
- 劉世安，〈導讀〉，收入海登·懷特著，劉世安譯，《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上下冊，臺北：麥田出版，1999，頁 xi-xxvi。
- 韓震、董立河，《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後現代歷史哲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理查·羅遜著，徐文瑞譯，《偶然，反諷與團結——一個實用主義者的

- 政治想像》，臺北：麥田出版，1998。
- 海登·懷特著，陳永國譯，〈歷史的負擔〉，收入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33-62。
- 海登·懷特著，陳永國譯，〈歷史的闡釋〉，收入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63-100。
- 海登·懷特著，張萬娟譯，〈歷史的轉義學：《新科學》的深層結構〉，收入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93-215。
- 海登·懷特著，陳新譯，彭剛校，《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 海登·懷特，〈歷史闡釋的政治學——規範與非崇高化〉，收入懷特著，董立河譯，《形式的內容：敘事話語與歷史再現》，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頁 80-117。
- Behler, Ernst. *Irony and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0.
- Burke, Kenneth. "Appendix D: Four Master Tropes," in Burke,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1945], pp.503-517.
- Burke, Kenneth.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1945].
- Dane, Joseph A. "Viconian Ironies," In Dane, *The Critical Mythology of Irony*. Athens, G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 pp.159- 171.
- Dane, Joseph A. *The Critical Mythology of Irony*. Athens, G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

- Domanska, Ewa. "Hayden White: Beyond Irony," *History and Theory*, 37:2 (May 1998), pp.173-181.
- Domanska, Ewa, ed.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8.
-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Golob, Eugene E. "The Irony of Nihilism," *History and Theory*, 19:4, Beiheft 19: *Metahistory: Six Critiques* (December 1980), pp.55-65.
- Hegel, G.W.F.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Aesthetics*. Translated by Bernard Bosanquet.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Michael Inwoo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 Howey, Richard Lowell. "Some Reflections on Irony in Nietzsche," *Nietzsche-Studien*, 4 (1975), pp.36-51.
- Inwood, Michael. "Irony and Romanticism," in Inwood, *A Hegel Dictionary*. Oxford: Blackwell, 1992, pp.146-150.
- Inwood, Michael. "Introduction," to G.W.F.Hegel,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Aesthetics*. Translated by Bernard Bosanquet.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Michael Inwoo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pp.ix-xxxvi.
- Jenkins, Keith.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 Jenkins, Keith.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 Jenkins, Keith. *Why History? Ethics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1999.
- Kansteiner, Wulf. "Hayden White's Critique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2:3 (October 1993), pp.273-295.

- Kierkegaard, Soren. *The Concept of Irony*. Translated by Lee M. Capel.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1965].
- Kramer, Lloyd S.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97-128.
- Lentricchia, Frank. "The Place of Northrop Frye's *Anatomy of Criticism*," in Lentricchia,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2-26.
- Lentricchia, Frank.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Nelson, John S. "Review of *Metahistory* by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 14:1 (1975): pp.74-91.
- Paul, Herman. "An Ironic Battle against Irony: Epistem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Irony in Hayden White's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55-1973," in Kuisma Korhonen, ed. *Tropes for the Past: Hayden White and the History/Literature Debate*.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6, pp.35-44.
- Pinkard, Terry, *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Roth, Michael S. "Thin Description: Richard Rorty's Use of History," in Roth, *The Ironist's Cage: Memory,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3-136.
- Roth, Michael S. "The Ironist's Cage," in Roth, *The Ironist's Cage: Memory,*

-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48-162.
- Vico, Giambattista, Thomas Goddard Bergin and Max Harold Fisch trans.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Unabridged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1744) with the addition of "Practice of the New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 White, Hayden V. "The Abiding Relevance of Croce's Idea of Histo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5:2 (June 1963), pp.109-124.
- White, Hayden. "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7-50.
- White, Hayden.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51-80.
- White, Hayden. "The Tropics of History: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New Science," i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97-217.
-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 White, Hayden.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 i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58-82.

On the Idea of Irony in Hayden White's *Metahistory*: With Comments on Keith Jenkins' Interpretation

Hsin-chih C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his essay first challenges Keith Jenkins' interpretation that Hayden White's *Metahistory* is espousing Irony by pointing to the obvious fact that, in *Metahistory*, White is critical to Irony instead. Next, using relevant discussions of Marx, Burckhardt, and Croce in *Metahistory* as examples, this essay illustrates not only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Irony as envisioned by White, but also White's overly extensive usage of this term. This essay then tries to explain why the idea of Irony is presented so negatively in *Metahistory*,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grounds upon which Irony may somehow transcend itself. Through comparing the discussions of Irony by Hegel, Vico, Kenneth Burke, and Northrop Frye, this essay asserts that, although White's treatment of Irony as one of four master tropes has inspiration in Vico, White provides his own interpretation by conceiving the four tropes as a circle or spiral. As for viewing Irony – now placed at the end of the circle/spiral – in such negative terms, this could have resulted from White's appropriation of Hegel's criticism of Romantic Irony.

Keywords: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Irony, Keith Jenkins